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吴文化专号

笔谈吴文化

文化世族与吴中文化

吴方言与文学

吴地的造船和水运

紫砂漫话

缪根宝 吴大琨等

严迪昌

范伯群 翁寿元

辛元欧

冯其庸

1990

11



医药学院610 2 01478688

文史知识

1990年第11期

(总第113期)

吴文化专号

《文史知识》编辑部、无锡吴文化公园学术指导委员会合办

• 题词 • 费孝通 邓鸿勋

薛暮桥 钱敏

封二

3

• 笔谈吴文化 •

历史的启示

缪根宝 3

发扬吴地经济文化的开拓精神

郁家树 曲大利 5

研究前景广阔的吴地文化

刘家和 6

源远流长的吴文化

唐嘉弘 9

笔谈吴文化

吴大琨 10

• 文学史百题 • 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

严迪昌 11

• 历史百题 • 丰富多采的吴文化

李学勤 18

• 怎样读 • 徐霞客及《徐霞客游记》

吕锡生 26

文 谈谈吴人的“文身断发”风俗

殷伟仁 31

化 从《白鹤舞》到《白紵舞》——吴舞探索

殷亚昭 36

源 吴方言与文学

范伯群 翁寿元 42

流 吴文化中一枝花——苏州评弹

蒋云仙 48

从考古学谈吴文化

梁白泉 53

诗 空灵旷逸 情致亲人

——谈文征明《月夜登阊门西虹桥》

黄 燃 57

赏 孤独的思乡曲——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葛兆光 59

• 古代科技漫话(40)(41) •

吴地的造船与水运

辛元欧 62

吴地水利的开发与利用

何荣昌 68

文化
史
知识

紫砂漫话

冯其庸 72

明清吴地中秋习俗

杨晓东 76

吴地的乡土艺术——惠山泥人

柳家奎 80

独具特色的土墩葬

何家迪 83

吴歌渊源何处寻

金煦 84

人物
春秋

功业显赫的吴王阖闾

王卫平 87

南宋杰出的诗人范成大

钟必琴 92

吴地名人录

何草 96

• 书画欣赏 • 吴地书风天下逸

张铁民 100

•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

古代东渡吴人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耿曙生 104

历史

太湖明珠——无锡

冯普仁 110

名城

苏州城三题

高泳源 115

• 文史研究动态 • 吴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达 118

中国第一个文化园林——吴文化公园

华建良 邱爱群 高燮初 124

编后

127

• 补白 9 则 • 横贯无锡的大运河(52)精美的苏绣艺术(61)吴越宝剑(79)崇安寺(82)虎丘“禁染”碑(91)吴地的雕版刻书业(95)吴门四派(109)苏州的古桥(123)吴门神医叶天士(126)

本期顾问 程毅中 冯其庸

发展吴文化的光荣传统

薛暮桥

吴文化是光辉的中华民族古文化的一部分，吴文化公园是教育后代人民，了解乡土民俗的好场所。

饶敏

·笔谈吴文化·

历史的启示

缪根宝

以上海为龙头，以太湖为中心，南涉杭嘉湖，北连苏锡常、宁镇等区域，是全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也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探讨她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轨迹，认真研究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养分，从中得到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有利于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政策，有利于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吴地自古以来，地处东南，江海阻隔，河湖纵横，在上古交通不方便，生产落后。但吴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显示了历史的奇迹。从先秦的“厥土涂泥，厥田下下”，两汉时期“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发展到唐代的“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明清时代的中央财赋仰给东南，到近代的工商业发达，富甲天下，后来居上。个中自有历史的契机和人民的勤劳。当今，很有必要从传统的历史文化深层来探究其原因。

首先，吴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筛选、吸收能力，并毫不保留地向外辐射，在古代成为向外传播先进文化的基地。三千一百年前，当地的土著文化吸收了以泰伯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形成新的区域文化——吴文化。以后五六百年中，吴国的强大，就

是吸收了以孙武为代表的齐文化、伍子胥为代表的楚文化之精华，形成了“孙子兵法”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十分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吴地在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一部分后，中原地区每次动乱，从客观上促进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例如，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南北宋时期，大量人才南迁吴地，加速了吴地经济文化的开发，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促使吴地高度繁荣；明清两朝五百多年中，市镇经济逐步形成，一跃而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先进地区；近代，民族工商业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吴文化在历史发展的历程中，人文荟萃，显示了高度的智慧与创造力。从古老的历史记载中，早在秦汉以前，吴文化已通过海上传播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东吴孙权派卫温率领的大舰队，出使亶州、夷州。以后，日本的遣唐使、中国的鉴真赴日、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都向国外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化，吴地成了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为发展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古吴文化发挥的历史功能。

其次，从明朝后期开始，吴地率先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吴地人民在遭受屈辱痛苦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上海迅速形成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地，后来又成为她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苏锡常等地新兴工业崛起，成为中国重要的工商业区。吴地人民有能力接受消化外来的科技文化。吴地同时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了大批新型人才。吴文化又一次显示了她的历史功能，向内地传播和辐射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吴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它不保守，不拒纳，它不仅能接受，而且能反馈，有强大的辐射作用，它的开放性，使它保持青春常在，宽广博大。这些历史经验，我们必须加以珍视和借鉴，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运用，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系中共无锡市委副书记、吴文化公园建国指导委员会主任）

发扬吴地经济文化的开拓精神

郁家树 曲大利

发源于无锡的吴文化，源远流长，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承前启后，勃勃发展，在古代文化的诸多支流中后来居上，培育了吴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学习吴文化历史，从她蕴含着的丰富内容中，吸取其经济文化中的开拓精神，对借鉴历史，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颇有裨益的。

吴地的古代农业，是中华古代文化中的独特成果。先秦之前，吴地人口稀少，沼泽遍地，农业十分落后。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为吴地农业发展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耕作技术。从三国至唐宋，历经漫长岁月的探索 and 开发，兴修了水利，改进了耕作技术，创造了高度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宋代单锷《吴中水利书》、沈括《梦溪笔谈》，以及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农业科学巨著，先进的农业科学文化，使吴地富甲天下，以后农业科学文化传播到国外，对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

吴地又是工商业的发达地区。适应经济的发展，吴地出现了许多商埠。一些重要商埠，店铺、客栈鳞次栉比，商贾云集，形成都市。明末清初，吴文化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消化融合，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工业。鸦片战争敲开了国门，上海开埠，吴地出现了大批现代工商企业，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苏锡常、杭嘉湖等新兴工商业区，新的经济因素注入了传统文化中，使吴文化的经济文化充满了生机，开创了历史新局面。

适应农业、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吴地历史上重文重教，兴办书院成风，即以无锡而言，二泉书院、尚德书院、东林书院，闻名于世。传统文化的熏陶和重文重教，吴地人才辈出，科举时期，“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吴地状元、进士全国最多。到近代，吴地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开创了新教育，大批知识分子赴欧美、

研究前景广阔的吴地文化

刘家和

近年看了一些关于吴文化研究的论著，觉得这是一个很应该也很值得研究的领域。说应该，是因为吴文化在中国文化研究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历史上有着日渐重要的趋势；说值得，是因为不少问题正在讨论或正待提出之中，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有利于中国文化以至世界文化研究的发展，所以在学术上有着颇为广阔的前景。

当吴国在公元前六世纪迅速兴起并在前六至前五世纪之交臻于极盛的时候，它的重要性看来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它又迅速灭亡了。因此，与晋、楚、齐等历时长久的大国相比，它又给人一个“昙花一现”的印象。那末，在吴的相对短暂的历史中就没有任何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因素吗？不，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吴曾做了前人所不曾也不能做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破记录的地位。《春秋》定公四年（前506）记：“冬十有一月庚午（十八日），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二十八日），吴入郢。”楚是春秋时期南方最强大的国家，长期地威胁中原诸国。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多国联军伐楚，所得到的只是与楚结召陵之盟，未能对楚有任何削弱。公

日本留学，造就了新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如吴县的冯桂芬，无锡的薛福成、徐寿、徐建寅等，还出现了大企业家荣德生、薛南溟，从新兴的民族工业出发，推崇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综上所述，在历史的演变中，吴文化的经济文化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蓄外来文化的长处，融汇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成为开拓进取的力量。历史上的吴地劳动人民，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头脑聪颖，善于学习，勇于开拓，加之辛

元前 632 年，晋文公率齐、秦、宋之师败楚于城濮，也只是打击了楚北上的势头。以后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称霸中原，最好时也只是保持了抑楚北上的作用，从来未能给楚以重创，更不用说入其都城。就在吴入郢的前一年，蔡因忍受不了楚的欺凌，请求晋出兵伐楚。次年春三月，晋国在召陵与大小十八国的代表（其中还有周王室代表）集会，以谋伐楚，最后因恐师劳无功而作罢。蔡不得已，转而求助于吴。结果吴大败楚，入其都。吴师在楚占领了约十个月。楚受如此重创，几乎亡国。又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中原，于公元前 486 年开邗沟以通江淮；随后四年中乃先败齐于艾陵，再与晋争霸于黄池。邗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大运河中最早开凿的一段，无疑这也是历史记录的突破。值得深思的是，原为落后小国的吴，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作出先前的和并时的大国所不能作到的事情？它如何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潜力？由于夫差在战略上犯了错误而且过度滥用民力，吴终于被越灭亡。越亡后又归于楚。吴作为国家在战国时已不存在，但是它所在的地区在以后的历史中仍然不时显示出它的潜力。我们知道，在反对秦朝暴政的斗争中，楚人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楚人中，真正摧毁秦军主力从而使秦灭亡者是项羽；而项氏起自吴中，吴中八千子弟是项氏劲旅中的核心。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五年卒亡其国”（《史记·项羽本纪赞》）这是比阖闾、夫差历时更短但更耀人眼目的昙花一现。这岂非吴中地区的潜力的又一次迸发？以后，吴地在西汉时曾属吴王濞的封国，在三国时为东吴的领土，在东晋、宋、齐、梁、陈时期成为南方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到隋唐以后，淮南江东已

勤劳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吴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吴地人民，继承了先祖文化中的丰富遗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管理，艰苦创业，不断开拓，创造了吴文化更加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文作者：郁家树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吴文化公园建园指导委员会第二主任。曲大利系无锡县县长、建园委员会副主任。）

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更不必多说。

吴国在春秋晚期为什么能显示出如此巨大的潜力？看来这与吴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开放的文化传统有关，吴地不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有利条件，而且地处东南各族与中原接触的前沿，便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和文献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地区很早就有开放的文化传统。考古学界在宁镇地区发现的湖熟文化乃是吴文化的前驱，这一文化即有南北文化交流的明显特点。泰伯奔吴，文身断发以从其俗。文献中的这一记载也说明吴的开端即具有南北两种文化的交融。甚至到阖闾、夫差时期，吴已有志于作中原霸主，可是其国君始终未采用中原的谥法制度（而楚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就改从中原办法），而保持了南北文化并存的传统。

正是在南北文化的相互撞击与交流的过程中，吴逐渐由落后转而为先进，到公元前六世纪时终于形成了巨大的潜力。这时吴人不仅掌握了中原所少有的造船与水战技术，而且掌握了中原熟悉的造车与车战技术；不仅掌握了出色的青铜冶炼与造剑技术（出土文物与文献皆有明证，直到战国晚期屈原在《国殇》中还把“吴戈”当作最精良的武器），而且同时掌握了锻炼与铸铁技术（见江苏六合程桥1号、2号吴墓出土资料）。这些都说明吴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与此相应，吴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历访鲁、齐、郑、卫、晋等中原国家，表现出了对中原礼乐与典章文物的高度理解与修养水平，成为中原贤者如晏婴、子产、叔向等所敬重的人物，这就反映出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突飞猛进。

吴在南北文化相互撞击与交流中形成了它的潜力，到了一定时期和条件下，这潜力就在吴与其他文化的撞击中显示出来。这样说明吴在春秋晚期的突起，从原则上说，似乎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思路。而且吴地以后的经济、文化发展，基本上沿袭了吴的传统，也可以作类似的考虑。当然，问题的解决，则有待于具体研究的不断深入与进展。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源远流长的吴文化

唐嘉弘

“吴文化”当然应指吴国及吴地的文化。但由于在南中国范围内，在文明时代，吴国处于最为先进的地位，其文化覆盖面自然不断扩大，相应的吴文化圈也自然随之扩大，吴国虽然灭亡了，但吴地文化却在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吴国的兴起，决非偶然，吴王夫差北向争霸中原，当有其相当的基础。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的文化不少与黄河中下游同步发展，某些文化甚至超过中原。如玉器、漆器、木构建筑、纺织、丝织以及水稻栽培等，均各具千秋，自有特色。吴国在此基础上，以长江下游河湖水网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接受中原长期实践形成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将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两个久经考验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互相渗透，相互融溶，因而形成为吴文化或吴越文化圈。在春秋晚期成为楚国的致命威胁，攻陷楚都，屡败楚军，进入霸国之林，吴国确曾盛极一时。

吴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颇为优越的，社会经济的下层结构是农村公社，《吕氏春秋》中提到墨子将得到“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书社即农村公社，高诱认为“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当有七千五百家。此时南中国吴越的村社，已经摆脱原生形态，应属次生形态，与中原地区类似。村社采取个体家庭合耦耕作方法。《国语·吴语》记吴王夫差向申包胥说：“譬如农夫作耦，以割杀四方之蓬蒿。”这里的情况和《论语·微子》中的“长沮、桀溺耦而耕”一样，并不如有的论著所说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耕作，而仅仅是二人互相合耦共耕。有人将吴越的“鸟田”释为以鸟为图腾的水稻，并将“鸟田”与“禹井”结合起来，断言就是“井田”得名的由来，显然乃为主观臆断。当时南中国流行刀耕火种，地广人稀，

笔谈吴文化

吴大琨

主持吴文化公园的同志发起笔谈吴文化。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要谈吴文化，就要从吴泰伯谈起，我正好姓吴，又是苏州人，记得幼小时，我父亲就和我谈过，说我们吴氏一族都是泰伯后裔。当时，我家有族谱，我后来打开族谱来看，见其中也确实记载着泰伯之后的历代子孙的名字，但可惜这本木刻的族谱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化为乌有了。至今想来，还感到非常可惜，因为根据这种族谱是可以研究出不少历史上的问题来的。记得过去有名的优生学专家潘光旦教授就大量征采过族谱，用来研究优生学。我不想研究优生学，却很想根据这些族谱来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这一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吴家的族谱，我估计也还可能在苏州或其他地区的某些吴氏家族里保存着，所以我想趁笔谈吴文化的机会把这一问题提出来，希望研究吴文化的同志，能够注意收集吴泰伯的族谱并把它公开出来，供大家研究。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大量益鸟在耕地上活动，故有“鸟田”之称。太湖区域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早期水稻遗存，确是源远流长。

适应河湖水网地区特点，吴越文化中渔猎采捕经济也十分发达。适应战争的需要，吴越文化中的青铜武器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吴戈”、“吴剑”、“吴冶”在古代达到了“微妙圣神”的高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荣，应当引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

(本文作者系河南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氏族、宗族、家族的由荣趋衰，或起微转显，它们所产生于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莫不载有深刻的文化印痕。所以，文化史研究固不应轻忽这封建体制赖以构建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族群活动现象，而包括区域文学史在内的地域文化的探讨，似尤需对此命题作一番潜心考索。这种综合考索，对中、近古时期以来的文化研究则无疑更见重要。

何谓文化世族

地域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有赖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演化。然而，相对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变易缓慢，有其特强的稳定性，因此，地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行程中发展推进，主要附丽于人文地理的更变。人，特别是人的群体性社会实践，原是一切文化的创造基因和动力；而人文地理的更变，其实正是人的群体性社会实践推促着政治、经济、教育、文艺以至风俗、语言等等的演变。在这演变过程中，文化世族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姓氏的族群均无例外地在不断发生分派流变。它们或者由于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族众各自播迁，或者因为政治生涯的升调滴迁而房派流衍别

地，至于兵火战乱和社稷倾圯之时则更易导致大批族群的南北迁徙。然而，在特定的时空间，流变常转趋稳定，旧有的和新兴的族群以及这些家族间联系而成的姻亲网络，很快又会组合起该地社会结构的重心。家族群的相对稳定性，恰恰是孕育文化世族的前提，并进而能够发挥其某种积累的优势。所以，如果说自然地理环境的缓慢变更，迟延着地域文化的演化，那么，人文环境在趋变过程中族姓的相对稳定，则推动着该地文化的新变。

文化世族，当然是地域望族，但并不等同于簪缨世家、豪门右族。关于此中的差异，《文氏族谱续集·序》有简明的分辨：“吴中旧族以科第簪缨世其家者多有，而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则莫如文氏。”事实是，豪门与寒族的界定，取决于政治地位及由之而形成的社会等第，唯其如此，豪右大族亦与寒微之门一样，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很大的不稳定性。或者举族沦败，或者大多数分支房派衰落，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同时，某些寒族又完全可能应运而起，成为新兴的钟鸣鼎食之家。文化世族则不同，它在家族承衍过程中，尽管其文化建树的具体实践也会受到政治经济地位的兴衰消长

的影响，但其在特定文化氛围熏陶下的积累，包涵着文化素质、精神以至各门类技艺能力的积累，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积丰厚，愈显优势。于是，人才辈出现象不仅呈现长久的绵延性，并且在共时性阶段构成爆发力极强的密集体。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中)说：“吴门前辈，自子传(陆师道)、道复(陈淳)，以迄于王伯谷(稚登)、居士贞(节)之流，皆及文待诏之门，上下其议论，师承其风范，风流儒雅，彬彬可观，遗风余绪，至今犹在人间，未可谓五世而斩也。”这里讲的是师承流传的渊源不绝，师承尚且如此，兼家教与师承二而为一的家学承传，即耳濡目染的熏陶、耳提面命的庭教所养成的“遗风余绪”，自然更不易“五世而斩”。何况，还不能不承认资质禀赋的遗传基因的客观存在性。很显然，正是族姓内部的家学和异姓之间的师承，共相互补地组成了历史文化承传发展的链条，繁荣着地域的文明，而前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每已成为母体，不断地派生着新的同宗或他姓的文化群。

吴中文化世族的特点及成因

文化世族遍布于华夏南北，并非只存见于吴中。但是，以太湖流域为幅员的三吴地区，这样的群体最见密集，自有特点。尤其自南宋以后，该地域家族文化的积累所透发出来的丰厚的才、识、学力，对

文学等事业的促进确实不可低估。三吴文化世族的特点，除了前已提及的历时性承续展延的跨度长，共时性密集涌现的密度强之外，还体现在其对大江南北以至全国范围影响力的辐射度宽广，知名度高。特别是在才能的综合性表现上，尤多全能型人才，即在文学、艺术、技艺、学术以至医道等各个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全能性。构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很多，从外部条件看，此间经济发达，物产富庶，因而教育兴隆，文化水平起点较高。加上区域社会生活环境相对安定，毁灭性战乱少，即便是明清易代的大动荡时期，除了外沿城邑如江阴、嘉定遭酷烈杀戮外，苏、锡、常一线基本未有大的破坏，这就为族群的承续、绵延、繁衍创造了稳定的生息环境，从而也具备了积累的不中断性。就文化世族内部构成因素看，科举体制的正负面作用的刺激固很重要，特定的心态似更值得注视。在浓重的文化氛围和紧密的族群网络中，那种力求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心性十分强烈，这是“遗风余绪”不仅不绝如缕，而且不时振起的重要保证。文征明为沈周长子沈云鸿(字维时)所作的《相城沈氏保堂记》，可说是集中而又具体阐述吴地文化世族的后裔们普遍心态的重要文献。沈云鸿为什么筑堂而取名为“保”？他的心理动因是：“鸿藐一身，上统百年之绪，属当仍世隆奕。至于鸿小子而有弗克，羞辱前人。”苏州相门

沈氏，由云鸿上溯四世，并无达官大吏，“仍世隆奕”乃是指的文化世族的荣耀。对这种心态，文氏有深入的阐发，他说：

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而师资源委，实以兴之。不幸而门第单弱，循习陋劣，庸庸惟其常。其或庶几自拔而亢焉，则深培痛溺，铄铄寸寸，咸自吾一身出，其亦艰哉！人惟其艰也，而又能是也，于是相与誉之；有弗良，亦置弗责，其素微无异也。使其有一线之承，则人得以比而疵之，以为尔门户若是，尔父兄若是，闻见丽泽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从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惧哉！夫门第之盛，可惧如此，乃不若彼无所恃者之易于为贤，岂此之所负固重哉！（《文征明集》卷十八）

“门第之盛”就是“上统百年之绪”的积累所致，对“诗书之泽”所被的族众子弟既是优越性，又是沉重精神负担。如像纨绔子弟那样坐享其“望”，必然才智闭塞，成为不肖子孙。相反，惴惴自奋，“负固重”的压力就能从消极面转化为积极的动力。“不以得之深自负，而以负之重自惧”，这话提炼了文化世家子弟的所有戒铭文字，十分深刻。“自惧”就能“不废而益勤”，如此，进可以不为“二三前烈”即自己的父祖辈的成就所掩，退也至少可以“屹

屹然保之”，世代继传。文征明这篇并不著称于世的文字，其实揭示了吴中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侧面。

新兴的文化世族不断起之于“门第单弱”的族群间，旧家世族子弟又多能“不以得之深自负”而思有以超越“前烈”而不玷家风。这就构成三吴文化世族所以能密集涌现并累世不衰的大格局。再加上南北流徙，交相融汇，如南宋初一大批“靡靡”南下的中原世族定居吴中，又如皖南歙、泾、休宁、绩溪一线及江西等地各姓族众在明清二朝的不断东迁三吴；前者如苏州东洞庭山的王氏，分支遍布吴县、吴江、昆山以至南汇、湖州的叶氏、徐氏等，后者如汪氏、江氏、程氏、潘氏以及明清之际科第特盛的彭氏等等。于是，这个地域的人文景观愈见绚烂，文化世族的数量和作用也愈益壮观。

顾氏家族与三吴文苑

吴地旧族向有“顾、陆、朱、张”为四大姓之称，顾、陆尤见支繁族盛。到南宋时陆游已说“吴郡陆氏，方唐盛时，号四十九支”（《渭南文集》卷三十五《奉直大夫陆公墓志铭》），他又自述：“某吴人，凡吴之陆皆同谱，所谓四十九支谱是也。”原来陆放翁这一支派是唐末从吴郡迁嘉兴，继迁杭州，吴越时再徙山阴鲁墟的。两浙陆氏，源自吴中，这当是事实。但是世系遥远，文献缺略，难免牵强附会，这在世

系推导中每有所见。比较起来，顾、陆二大姓在三吴地区稍见稳定，江东顾姓更未远徙。据知顾氏全族在清初已分有七十余支，但就在明清之际，大抵仍未衍出江苏一境及毗邻的浙西数邑，而且大宗旺支皆散处吴门周围。因此，其与三吴文苑的影响关系最大最密切，并脉络清晰。

宋以前，文化重心在中原，在晋冀鲁豫地域，吴地崇文局面还未盛开，尚武风习仍存。所以如顾姓世族中，尽管东晋有顾雍、顾恺之，南朝陈有顾野王，中唐后期有顾况等，但卓有影响的群体尚未形成，殆同陆姓的东晋有陆机、陆云一样，只有点式才士的活动。而且他们大多文武兼长，多以武功建树为要，并多赖门阀世荫显称于世。这也与唐以前吴门地区还未繁华，人口亦稀适相同步，迨至五代的吴越立国以至两宋，始趋繁荣，人口也成倍递增。这样，要经过一个孕育时期，新旧文化世族对吴中文苑的构成才真正发挥其作用。明代弘治年间，张习曾有“吴中之诗，一盛于唐末，再盛于元季”之说，其实，唐末之盛，远无元季之盛影响深远，后者真正造成了一种地域风气，是考索三吴文风的关系甚大的一大转捩，其核心人物是顾氏昆山一支的顾阿瑛。

顾阿瑛，又名瑛，原名德辉，字仲瑛，别号金粟道人，著有《玉山璞稿》。往昔提及顾阿瑛往往只

注意到他轻财结客和亭园声色之盛，忽略其处乱世而放达自全，与朝政持不合作态度的行为。特别是对他在吴中发生的影响，估计极不足。《铁网珊瑚》转引的于立《金粟冢中秋日燕集后序》有几句话极堪注意：“仲瑛附先生营茧室，自铭其墓，题曰金粟冢，则知仲瑛之旷达，盖有昔贤司空图、傅奕之遗风焉。千古在前，万古在后，生而与故人饮酒泉台之上，则句吴自顾君始也。”顾阿瑛《自题小像》诗有“天下青山骨可埋”之句，这多少承沿自苏轼的自求“心安”的意理以及再早些司空图的心态。只是有发展，“千古在前，万古在后”云云，是扶住其重在眼前的现实人生态度。他大隐于市而又不废声色享受的清狂放逸，寄情于艺，是富庶的物质条件和风雅高洁自守的操行，在动荡的浊世政治环境下的特定结合物。“句吴自顾君始也”，其给吴文苑留下的“风流儒雅”式的不拘礼教，放浪通脱的风调，从此绵延不绝。换句话说，他开出了吴中近古时期那种清脱出俗，隐于艺事，优游雅集，任情自放的“玉山风”。到明初经“吴四杰”高启等人皆未善终的政治威慑之后，此风陡盛。“著道衣”或“被古冠服”，逍遥池馆间蔚然成风；“以顾玉山拟之”云云则成为品评吴门士流的常见语，甚至以“金粟公子”为号的也有人在。

《元诗选》这部一代总集的编者，唯亨支派的顾嗣立在清初访

阿瑛“玉山草堂”时感喟说：“缅想当年草堂文酒之会，真吾家千载一佳话也！”这是顾氏族裔对这位造成“长短杂体，靡所不有，可谓盛矣”的先人的向往。事实上，在明代前中期，顾氏本族中承沿“玉山风”的就指不胜数，著名的如顾祖辰（字子武）。这是被文震孟《吴中先贤小记》盛加赞颂的人物，也是汪琬在《尧峰文钞》的《忘庵王先生传》中称为吴门隐逸巨宗的文学艺术家。《列朝诗集小传》转述顾祖辰生活情貌说：“老屋三间，破榻竹几，庭中古树一株，杂花数本，间作小诗及画，不以示人，自娱而已。”“自娱”，是吴中文化心态的相当突出的一个模式。而且这种“自娱”多带置身于庭园景物间的特征，这多少应从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格化逆向）意义上去辨认，方能探得真蕴，也能对自东晋顾辟疆建“辟疆园”而到明清园林大盛的深层机制有所体察。又据钱谦益说，顾祖辰这种风格，实继之其祖顾兰、父顾德育。《文征明集》卷二十七《顾春潜先生传》曾记录了顾兰“肆志为高，以隐约自胜”，“而于世俗应酬，仕路升沉，与凡是非征逐，一切纷华之事，悉置不问”的品性和行为，足见“玉山”遗风泽被之广。

“玉山风”的影响远不止顾姓本族，它还造就着别姓文化世族，其中关系吴中文苑最大的是“相关沈氏”，即沈周家族，这是吴中一个典型的全才型的文化世家。沈周不

仅为画苑一代宗师，其诗文亦极被推崇，“一时巨公胜流则皆推挹其诗文”。他对文、祝、唐、徐所谓“四家”的影响也是全面的。对沈石田的家学，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九有“沈石田世家”一则，谓“家学相传，前辉后光”，并还列举其自祖父沈澄（字孟渊，号菑庵），到父亲沈恒（字恒吉，号同斋）、伯父沈贞（字贞吉，号南斋），以及石田之弟沈幽（字翊南），长子云鸿，孙子沈渭（字伊在）无不诗文书画兼擅，家学承传不绝。最值得注意的是《列朝诗集》“乙集”的“沈征士澄”小传，说他“永乐初，以人才征，引疾归。好自标置，恒著道衣，逍遥池馆”，“居相城之西庄，日治具待宾客，饮酒赋诗，或令人于溪上望客舟，惟恐不至，人以顾玉山拟之”。从顾阿瑛到沈澄、到沈周，又发展到文征明、祝允明、唐寅一脉，完全可以清晰看到吴中文苑的演进脉承。同时，这对认识明代文人结社风气特盛，而又以三吴为中心地的文化史现象，亦很有启迪。

在明清时期，顾氏分支已是繁多，如黄埭分支十数世科第鼎盛，仁孝里、梅社等支学人辈出，而昆山各派的人文之盛，只要提及顾炎武，就足够钦羡了。这里只想补充简述无锡一派和吴县唯亭一支。无锡一派是从唐代顾德玉始迁的。这一支到明代传至顾可久（洞阳）兄弟辈，转入鼎盛，下衍十数世人文萃发不衰，与无锡另一支不同房派的

顾宪成(泾阳)家竞相辉映。顾宪成是东林魁首,其侄孙顾杲系复社名士,与陈贞慧、冒襄等“四公子”齐名,后抗清殉身。宪成曾孙顾贞观兄弟姐妹则为清初著名的词人。而顾可久的嫡裔中,不仅子侄如顾起经、顾起纶等以政绩、文章名世,顾道淳以史学专长,更有五世孙顾宸重创辟疆园,为海内艳称之出版家、藏书家;顾宸之子顾彩乃是与孔尚任合作的成就卓著的戏剧家。顾宸曾孙辈则有顾奎光、斗光兄弟,是诗人兼学者,更是梁溪著名文学家杨芳灿、杨揆、杨英灿兄弟的亲舅父兼业师。顾奎光四个儿子即顾敏恒等亦皆为诗人词家,敏恒兄弟的儿女中顾翰的《拜石山房集》海内知名,顾翊及女词人顾翎也成就斐然。顾氏族众中还有顾祖禹这样的大学者,而顾光旭的《梁溪诗钞》乃乡邦文献中的巨著。无锡顾家对三吴文学事业的贡献极大,这是与梁溪地方的秦家、华家、邹家、侯家等都可以写成文化家族史的专著的重要族群。

唯亭顾氏,据《唯亭顾氏家谱》卷九“艺文·著述”的载录,就从顾予咸一辈算起,五世之间即有三十余人传世之作近百种。顾予咸八个儿子中,第七子顾嗣协是清初“依园七子”的核心人物,第八子即顾嗣立,他的《元诗选》的纂成,其功极伟。唯亭顾氏的文化遗泽源远流长,迄今未衰,已故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以及健在的如顾廷龙先生,

均系此支裔族。

宋以后迁吴的文化族群

吴中文化家族,前已说及,并不全属唐宋以前的旧家,南宋以后迁徙入境的占很大比例。主持明代中期吴文苑坛坫与吴宽齐名的王鏊一族,就是“自汴京扈宋南渡”定居洞庭山而成为望族的。这一支自王鏊、王延喆父子之后,数百年间名流辈出,如王武(忘庵)之在明末清初,王岂孙(铁夫)之在乾嘉之际,都是吴文苑的闻人。

又如吴江叶氏,到叶绍袁夫妇及子孙三四代间,不只是群体密集,连女诗人也涌现十数位,而且涌现出叶燮这样的大文学家,沈德潜、薛雪均问诗学于他,深刻地影响着三吴诗坛。而与叶绍袁为姻亲的吴江沈家,沈璟父子叔侄构成了“吴江曲派”的壮观阵营。此外,清初小说评点派的中心其实亦在吴门,毛宗冈父子,金圣叹,无不出之于世家之门。

而娄关蒋氏则是南宋自宜兴分支而来。蒋超伯《南窗樗语》卷一说“凡江南蒋氏,皆出山亭”,即东汉袭封于宜兴(古称阳羡)的蒋澄之后。“至宋时,之奇登侍从,之翰守苏州”,以后“吴中之蒋,分为三派,一居长洲,一居常熟,一居宜兴”。长洲一派即苏州娄关蒋氏。考之三地蒋氏谱乘,信为事实。三吴蒋氏在江东的影响不在顾、陆旧家之下。娄关蒋氏,从明末到清中